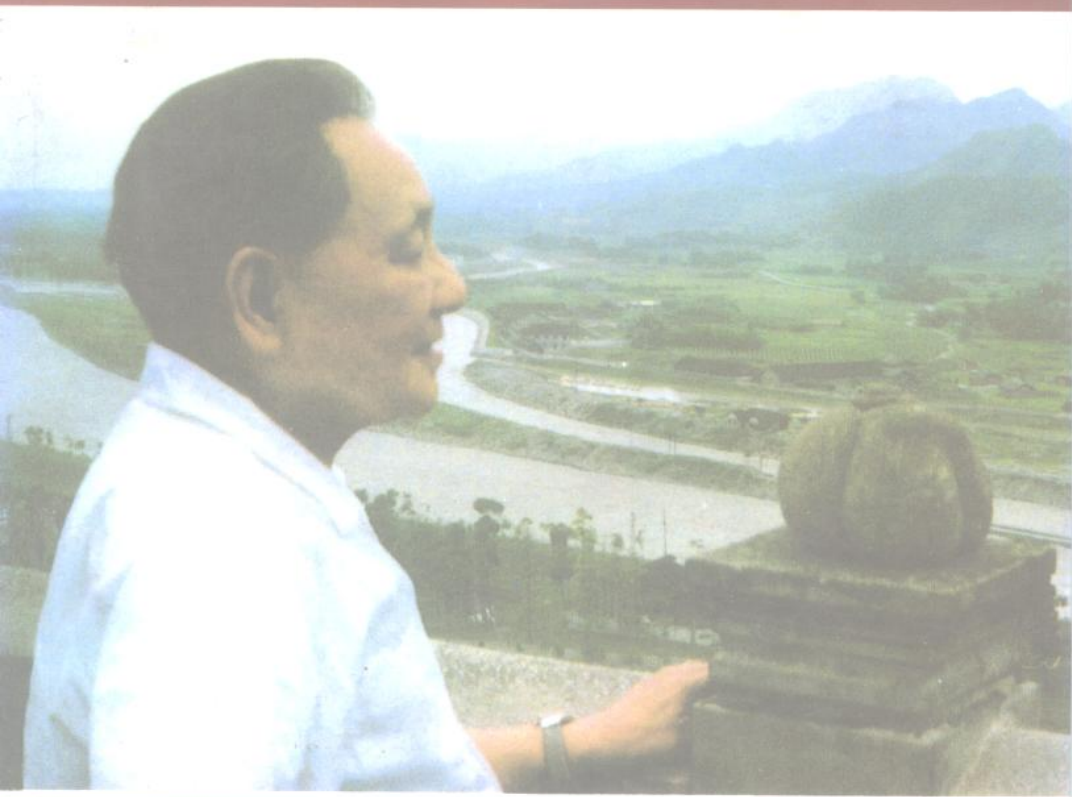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大思路

——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

金 羽 陈先奎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大思路
——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
金 羽 陈先奎 等著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北京北郊华生印刷厂排版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 9.5插页3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08 000 册数: 1—5 000

*

ISBN 7—300—00522—5

D·60

定价: 3.10元

DI12/16

作 者 的 话

1988年12月，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我们撰写了《当代中国大思路——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作为一件小小的礼物，奉献给广大读者，谨资以纪念。

本书各章的作者分别如下：

前言，金羽；第一章，周宁；第二章，刘森林；第三章，徐志宏；第四章，陈先奎；第五章，石亚军；第六章，易豪精；第七章，许志宇；第八章，陈先奎；第九章，张康之；第十章，陈先奎；第十一章，辛向阳；第十二章，周宁；第十三章，陈先奎；结束语，陈先奎。

金羽主持了本书的编写工作，并对全书统一修改定稿。

本书在酝酿、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郭影秋和凌静同志等一些领导同志的关心和鼓励；本书在审定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李淮春同志和责任编辑铁恩惠同志等的热忱支持和帮助，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国内有几家出版社相继约稿，特别是广西人民出版社曾经把它列入出书计划。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本书未能在广西出版。为此，我们谨致以深切的歉意；同时，对于广西人民出版社和其他一些出版社曾经给予我们的热情支持，谨表示

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其中失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地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1988年10月于
北京西郊中国人民大学
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序战——1975年的整顿 工作：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尝试	13
第二章 由“恢复”到工作着重点的历史性转移	37
第三章 改革：迎接两大历史新潮的决策和智慧	59
第四章 安定团结、政治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治国之道	77
第五章 面对接班问题的挑战	103
第六章 为建设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执政党而努力	125
第七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48
第八章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中国统一的科学构 想，一种新的政治哲学	170
第九章 特区建设和对外开放	192
第十章 他为什么能成功？——答案之一：邓小平在长 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政治影响力	218
第十一章 他为什么能成功？——答案之二：邓小平独 具特色的现实主义	236
第十二章 他为什么能成功？——答案之三：邓小平的 领导思想、方法、风格和艺术	258

第十三章 他为什么能成功? ——答案之四:邓小平理 论活动中的创造性思维	275
结束语	289

前 言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赵紫阳受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托，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指出，九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这条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在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决策中，在建设、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开拓中，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前，摆在思想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在深入研究和阐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其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同时，要加强研究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宣传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因此，我们撰写的这本书着重研究从1978年到1988年这十年期间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探讨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在20世纪最后的二十年里，我国以结束“文化大革命”和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契机，实现了由所谓“革命”与动乱，到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邓小平被人民选择为一位主要的决策人物。因此，只有站在这一

历史转折点上，我们才可以对邓小平在我国历史发展上的独特贡献和历史地位，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1976年毛泽东病逝以后，我国的历史发展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变关头，邓小平是以自己的睿深智慧和政治影响力，促进、推动和组织了这一巨大的历史转变的主要决策人物。对此巨大的历史转折的丰富内涵和深远的意义，尽管从它发生时起到以后，人们不断会有从各种不同侧面的探讨和评价，但是，最引人注目的，却是使我国实现了由“革命”与封闭，到改革与开放的空前变革，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与斗争的主题，转变为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稳定与发展目标模式，从而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心以至对整个世界的现在与未来，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在中国现代史上，毛泽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最重要、最为关键和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即使本世纪中叶在全世界通过革命，领导人民取得政权和独立的政治领导人中间，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的成功，也是非常杰出的。以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权威，就不得不向毛泽东的中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无论是在晚年斯大林个人的政治生涯中，还是在当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交往关系上，都十分罕见的。但是，正是由于长期从事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功，在毛泽东及其那一代人的意识上，都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一种“以革命的手段解决问题”的心理状态，以致当后来毛泽东个人的“革命”意识再一次崛起时，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社会压抑和抵制。

1956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社会主义事业在不

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开始陆续暴露了一些问题与弊病，其中包括一些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共产党内与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国内的某些非社会主义倾向，共产党和政府机关中的某种程度上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特权倾向，等等。任何社会都有它自身的弊病和问题，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因此，上述一些问题和弊病的出现，是不足为奇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而已。但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晚年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将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毛泽东从1949年到1956年，从事了一个短暂时期的建设性事业，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恢复和重建了被战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创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面对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的挑战，又想到了革命和斗争的问题。在1957年以后，毛泽东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革命与改革之间游移，时而搞运动，抓阶级斗争，时而重建设，对社会主义的某些方面作了调整与改革的探索。但是，一直到掀起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继续革命”就在毛泽东晚年思想中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

所谓的“继续革命”笼罩了整个中国，改革、调整的探索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被无情地淹没；刚刚开始的现代化进程被人为地中断。毛泽东的一生，也由此形成了一个由革命到建设，再到“革命”的三部曲，而后者却正是晚年毛泽东个人和年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悲剧所在。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促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觉悟空前提高，邓小平依靠这种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的觉醒的力量和智慧，

最大限度地尽了一个经验丰富、德高望重、又屡经磨难的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的难得的能力，推动、引导和组织我国走出了“革命”和动乱的漩涡，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和整个国家、民族的注意力转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就使我国的主题，由运动与革命转到了稳定与发展上来，并在毛泽东所展示的革命——建设——“革命”的历史链条中，去掉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环节，而重新置换上社会主义改革的环节。从而纠正了晚年毛泽东的错误，顺应了现代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创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属于建设范畴）、到社会主义改革（只是指改革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和驱动机制）的社会发展逻辑。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从1984年决定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模式起，就在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大大缩短了在一些东欧国家长达几十年的反复和阵痛期，在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基础的再构造和企业内部机制的转变，市场体系尤其是资金市场和采取双轨制战略推进，保持着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和潜力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卓有成效的探索，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邓小平在积极倡导和推动社会主义改革的同时，也大力倡导和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从表面上看，似乎由“革命”到改革的转变较为引人注目。但是，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和近代中国的变革的更宽广的范围和更深层的社会以致文明发展的内容来看，与由“革命”到改革的转变相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由封闭到对外开放的转变，实际上具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新加坡的一次讲话中曾经说过：当代最不朽的重要事件就是中国结束了

它与世隔绝的时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从政治、战略、商业或文化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种重大的转变。^①

我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就有了一定的发展。秦置“典客”（九卿之一）专管对外事务；汉通西域，开辟了从新疆经中亚通往中东和欧洲的著名的“丝绸之路”，远达罗马帝国（时称大秦），与亚洲近邻也有发达的贸易关系。到了隋唐时期，对外贸易尤其是海上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隋朝时，中日两国的贸易络绎不绝。唐朝时，与亚洲各国的贸易尤为发达，唐朝的大海船远航到波斯一带；同时，唐朝还把长安、洛阳、泉州、扬州、广州划为对外通商的都市，并在长安设有“鸿胪馆”，专门接待外国使节和管理对外贸易。而且，唐朝还明令保护外商，鼓励外商来华贸易“任其往来遍流，自为交易”，从而不但促进了各国人民的友谊，而且也促进了相互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本国经济的空前繁荣。宋朝时期，通往欧洲的陆路和海上交通都比较畅通，对外贸易的规模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是由明朝开始的。明朝初年，朱元璋消极保守，由于他兼并群雄时的残余势力逃入东南沿海一带和潜在的倭寇之患，便实行“海禁”，肇中国“闭关锁国政策”之开端。但“海禁”时紧时松，到明成祖朱棣时，则开“海禁”，果敢地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对外政策，向海外诸国派遣使节开展海外邦交活动。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七下西洋，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进行了当时规模最大的海上活动，远达阿拉伯半岛以及非

^① 参见1988年7月11日《世界经济导报》。

洲东岸,使中国古代的航海业达到鼎盛时期。然而明朝中叶以后,闭关锁国政策又占了上风。

清朝时期,实行“海禁”政策最盛。清朝初年,为对付明朝残余势力及郑成功,严禁商民出海,违者一律处死。在康熙、雍正年间,虽然逐步解除了“海禁”,但是又严格实行对外贸易限制政策,并对进出口贸易实行封建垄断,使中国对外贸易走下坡路,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向前发展。从明朝中叶算起,将近三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①,然而,恰恰在此前后,是世界资本主义开始急速生长的大变革时期,中国就由于失去了与之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机会而不可避免地落后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虽然执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是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也是对外开放的,只不过是对苏联东欧国家开放。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性的“冷战”气氛中,长期敌视和封锁我国,对我国搞禁运,以及苏联撕毁同我国的经济合同,撤走专家,我国同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关系大为缩小。我国关起门来搞建设,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后,严重地曲解了自力更生的方针,把它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对立起来,以致被国际社会视为“非开放”国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对外开放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由经济

^① 《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引自1985年11月1日《羊城晚报》。

特区、沿海对外开放城市，对外开放地区等实践模式。我国终于开始真正跻身于国际社会。这在近代中国以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也是一个空前的壮举。随着对外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中华民族全方位地进入国际社会及世界体系，中国已成为真正的世界的中国。中国在国际上采取了日益广泛而全面的互利与合作态度，中国这个市场的巨大潜力及其对今后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作用正在日益显示出来。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界具有远见的人士之所以极力赞扬中国的全面对外开放，也正由于其认识到了这一层意义。

而这一切，都是在邓小平作为我国主要决策人物的年代里发生的。尽管他只是起了一种顺应人心的推动和倡导作用，尽管人们再也不会做那种把一切功劳都归功于某一个人的盲目崇拜的蠢事。但是，人们对邓小平在我国的历史转变关头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与巨大影响，也决不会低估的。

在我国由“革命”（实为动乱）与封闭转变为改革与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与已经觉醒了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尤其是与中国思想理论界一起大胆探索，努力创新，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从而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在进入新的理论境界的过程中，虽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探索与创新是一个决定性的方面，虽然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探索与创新有着更为宽大的广度和更为深厚的深度，但是，我们也仍然不难看到邓小平在许多方面的卓越贡献，尤其在把中国人民，中国思想理论界的理论成果凝结或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及其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方面，邓小平更有着历史所赋予他的那种主要决策的作用。而且，在进入新境界方面，他更毫无疑问地应该是一位先行

者或开拓者。

这一崭新的理论境界有两个主要特征。

第一，深刻的历史反思或理论思考。在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历史反思的经验总结活动。第一次是在抗日战争中期，以延安整风运动的形式，总结了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之间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检讨了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与方法，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第一次飞跃，毛泽东思想也由此达到了成熟的境界。第二次则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有了切身的体验，痛定思痛，开始清醒地认识到极左路线的危害性，迫切要求拨乱反正，重新审视过去在我国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

邓小平作为“文化大革命”要予以打倒的中国第二号“走资派”，也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起遭遇到空前的不幸和磨难。然而，正如毛泽东曾经列举的“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历史现象一样，邓小平在北京被揪斗以后，放逐江西的岁月里，也一样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或理论思考。因此，当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正式重新出来工作以后，就已经对当代中国的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有了一系列比较成熟的见解和结论。早在1977年邓小平写信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要求出来工作的信中，就已经提出了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主张。而当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在酝酿和被压抑的时候（甚至这一问题的酝酿本身就与他的一

些见解有关），他就敏感地抓住了这一问题的实质，并由此倡导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由此引发了一场锋芒指向建国以来的“左”倾路线的思想解放运动，唤醒和激励了人们普遍的反思意识，和在实践的审判台上重新审视一切的批判精神，以致使这种批判的实践理性实际上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的最有光彩的部分和最为明显的特征。

在这一时代精神的指引下，人们不仅重新反思或批判地审视“文化大革命”、建国以来以致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而且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及其传统的中国文化也进行了空前深入的研究、分析与批判；同时，人们在批判中国的“左”倾思想及教条主义和“斯大林模式”的时候，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许多已有的结论或个别原理，也重新得出了自己的不同的结论。

第二，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的思维结构。过去，在“左”倾思想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关注于姓“资”，还是姓“社”的意识形态纯洁性的思维结构。在这一思维结构的桎梏下，一件事不管它产生了多好的社会效益，只要它是新的，人们就要以纯意识形态的卫道士的眼光，提出一个它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一旦发现姓“资”的嫌疑，又马上就会绷紧了那种铁马金戈似的“阶级斗争”之弦，以致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被片面地解释为只讲斗争的学说，和可以用来剪裁实践的裁缝刀。

然而，改革开放十年来，邓小平却在其早已深入普通百姓人家的“猫论”的标志下，大力提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

现实主义，以实践和生产力标准检验一切。他所倡导和推动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其实质也是一种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建设的事业，它所要求的不是在姓“社”或姓“资”上的纠缠及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而是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主客体要素的发展及其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稳定与发展的建设性的多角度的思维结构。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自身所具有的和他所大力鼓励与倡导的是一种民族的反思意识及重新在实践和生产力的标准面前审视一切的批判精神，是一种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的思维结构，它们共同构造了进入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新境界的一种内在的思维机制。正是在这一思维机制的作用下，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才产生了第二次飞跃，并初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及其一系列新的理论见解，从而在理论发展的内容上也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

但是，由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其初级阶段的理论这篇大文章才刚刚有了一个较好的题目和序言或导论，由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还远远没有达到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和临近最后成功的程度，因此我们一定要头脑冷静切不可盲目乐观和赞美过多。我们要非常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要有一个大的发展，中国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虽然面临着转移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 and 解决一系列新的重大课题，得出一系列新的重大结论的使命，但是，我们毕竟只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已。我们的有些新见解还有待改革开放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尤其要过

改革攻坚这一关；同时，改革攻坚关及其以后的改革开放实践对于我们也仍然是一个自在的必然王国。邓小平的思想理论也将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们要沿着邓小平所开拓和倡导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道路，进一步向改革的必然王国进军，做好他所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其初级阶段理论的大文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辜负这位中国以致国际性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开拓者和先行者的期望，才能结合以后的实践，在他已经作出、而又来不及系统阐述的那些包含着成熟的实践的智慧和丰富、深邃的理论内涵的一系列卓越见解的基础上，真正形成一个崭新的思想理论体系。

科学的思想理论之花必然结出经济之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成绩巨大。从总体上看，我国与国际间的经济差距明显缩小，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从而使我国与他们的经济差距相对缩小；第二，经济实力显著增加，主要工农业产品世界位次前移，占世界份额上升，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影响；第三，主要农产品、原煤人均量已经基本接近世界人均水平；第四，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大大提高了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参与程度。我们为有这样的成就而自豪。当然，现在我国与国际间的经济差距还严重存在，我们切不可因十年成绩巨大而丝毫懈怠。但是我们有信心有能力逐步缩短与国际间的经济差距。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的历史功绩在于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卓